

“双减”政策背景下家长课后服务满意度及其影响因素——一项基于 S 市的实证调查



张天骄*

上海市徐汇区行政学院, 上海 200030

摘要: 基础教育减负不仅是中央教育改革的重点也是国民最为关切的问题之一, 其中课后服务的质量更是学界关注的焦点。基于一项“双减”政策背景下课后服务情况的调查, 运用描述性分析、回归分析等统计方法, 分析 S 市家长课后服务满意度及其影响因素。得出主要结论如下: 家长对学校提供的课后服务整体满意度比较高, 说明“双减”政策在提高课后服务水平方面成效显著; 影响其课后服务满意度的因素主要有孩子的作业量、孩子睡眠时间、综合能力提升以及家长对“双减”政策的了解程度等。对此, 提出一方面仍需强化学校履行课后服务的主体责任; 另一方面持续推动精细化施策, 进一步提升学生和家长的满意度和获得感等政策建议。

关键词: “双减”政策; 课后服务满意度; 影响因素

DOI: [10.57237/j.edu.2026.03.001](https://doi.org/10.57237/j.edu.2026.03.001)

Parental Satisfaction with After-School Services and Its Influencing Factors Under the "Double Reduction" Policy: An Empirical Study of S City

Zhang Tianjiao*

Shanghai Xuhui District Administration Institute, Shanghai 200030, China

Abstract: Reducing the burden of compulsory education is not only a key focus of the central government's education reform but also one of the most pressing public concerns, so there are lots of studies on the quality of after-school services. Based on a survey concerning after-school services under the "Double Reduction" policy, this study employs statistical methods, including descriptive and regression analyses, to examine parental satisfaction with these services and its influencing factors. The main conclusions are as follows: parents exhibit a relatively high level of overall satisfaction with the after-school services provided by schools, indicating the significant effectiveness of the "Double Reduction" policy in enhancing the quality of these services. The primary factors influencing parental satisfaction include the volume of children's homework, their sleep duration, the enhancement of their comprehensive abilities, and the parents' level of understanding of the "Double Reduction" policy. In light of these findings, this paper proposes policy recommendations.

基金项目: 上海市哲学社会科学青年项目“上海市义务教育优质均衡发展的政策实践及其对学生教育获得影响研究”(2023ESH004).

*通信作者: 张天骄, tjzhang17@fudan.edu.cn

收稿日期: 2025-02-10; 接受日期: 2026-05-07; 在线出版日期: 2026-05-19

<http://www.educationrd.com>

On one hand, it is necessary to further strengthen the primary responsibility of schools in delivering after-school services. On the other hand, it is crucial to continue promoting refined and targeted policy implementation to further improve the satisfaction and sense of gain for both students and parents.

Keywords: "Double Reduction" Policy; After-School Service Satisfaction; Influencing Factors

1 引言

基础教育减负不仅是中央教育改革的政策重点也是社会最为关切的民生问题之一。2021 年,中共中央办公厅、国务院办公厅印发《关于进一步减轻义务教育阶段学生作业负担和校外培训负担的意见》(简称“双减”政策),一时间引发社会的广泛关注与激烈讨论[1]。通过对中国知网文献总体趋势的可视化分析可以发现,有关“双减”主题的研究在近五年成为热点。2023 年,“双减”相关主题研究达到顶峰,公开发表的文献达到 12495 篇,说明“双减”的出台具有轰动效应。从检索结果来看,当前学术界关于“双减”的研究集中在政策实施、作业设计、措施优化等主题,对于课后服务的效果讨论较少,尤其从家长视角来评价课后服务效果的研究相对更少。

随着“双减”政策逐渐在全国各省市落地,作为试点城市的 S 市,也相继发布一系列政策,并进一步明确提出全面压减作业总量和时长、提升学校课后服务质量等措施。从已有研究来看,当前课后服务市场仍存在服务模式不清晰、财政投入不足、质量参差不齐和社会资源利用不充分等问题[2, 3]。由此,如何保障和提升义务教育阶段课后服务质量,成为“双减”政策能否顺利推行并实现政策目标的题中之义。

基于此,本文选择 S 市为调研地点,运用描述性统计、OLS 回归模型等实证方法,研究“双减”政策实施后家长对课后服务的满意度情况并探究其中的影响机制,以更好地提高政策效果。

2 文献评述与研究假设

如何做好基础教育阶段的课后教育是个全世界共性问题。从上世纪八十年代起至今,国外部分发达国家已经探索出较为成熟的基础教育阶段课后教育的制度保障与服务模式。比如,美国基本建立起一套以教育部门为主导、社区为载体、家长配合三方责任分工明确的社会福利事业的课后服务制度模式。[4]在东亚,2004 年韩国便启动“放学后教室”项目,2014 年宣布小学课

后托管全覆盖,托管费用主要由财政承担。[5]2020 年,新加坡基本实现所有小学配备学生托管中心,为学生提供有益的、有组织的课后支持[6]。日本在推进课外托管教育方面,遵循国家主导、都道府县推进、市町村为主体、学校与教师配合、家长参与、社会支持的原则,实现各参与主体“自上而下,各司其职”。[7]

“双减”政策实施 5 年来,在减轻学生学业负担、提升教学质量、优化课后服务、规范校外培训、提升家长满意度等方面取得显著成效。[8]从政策过程来看,顾艳丽和罗生全梳理了近年来有关中小学课后服务的系列政策文本,归纳出当前课后服务政策的三大价值取向。[9]“双减”旨在从提升课堂教学水平、开展课后服务和治理校外培训三个维度发力,通过同时改革“三大课堂”,推进学生家长减负,提高人民教育满意度。[10]在政策实践效果上来,一项对全国 30 个省(市、区)137 个地级市的调查表明政策实施后,中小学生学习量明显减少,自我管理作业能力增强,一定程度上缓解了学生焦虑情绪。[11]还有研究发现“双减”实施后,72.7%受访家长表示教育焦虑有所缓解。[12]由此,研究提出本文第 1 个假设:

家长感知孩子学业压力变化与家长对课后服务满意度之间呈显著正相关关系(H1)。

此外,有关课后服务作业改革等问题,也是学者们关注的焦点。[13]其中,有关于作业量的“减”和作业设计、教学质量等方面的“加”,成为作业改革的关键。因此,研究结合 S 市的政策实施内容,分别提出假设 2 和假设 3:

家长感知孩子作业量变化与家长对课后服务满意度呈显著负相关关系(H2);

家长感知孩子睡眠时间化与家长对课后服务满意度呈显著正相关关系(H3)。

有学者提出,政策目标不仅是“双减”更要做到教学质量和效果的“双提”,最终实现学生的全面发展和健康成长。[14]由此,提出本研究的第 3 个假设:

家长感知综合能力提升变化与家长的课后服务满意度呈显著正相关关系（H4）。

此外，政策感知相关研究认为，良好的政策感知能力是组织和个人捕捉政府调控方向、应对环境不确定性的重要基础。[15]有研究基于教师对“双减”政策的感知，发现“双减”政策的实施使家长、学生负担得以减轻，社会正向效应凸显。[16]对此，本文提出假设 5：

家长对“双减”政策的了解程度与家长的课后服务满意度呈显著正相关关系（H5）。

3 研究设计

考虑到 S 市各区的经济发展水平和教育资源分布存在差异，因此研究团队随机抽取 3 个中心城区、3 个郊县的 6 所初级中学开展调研，以确保研究的代表性与可信度。研究通过网络渠道向家长发放问卷共计 1000 份，回收有效问卷 994 份，回收率达 99.4%。

从样本分布情况来看，本次抽样家庭城镇户口占比 61.17%，农村户口占比 38.83%；育有男孩的家长占 49.8%，育有女孩的家长占 50.2%；初一年级学生占比最高达 44.37%，初二、初三年级差别不大分别为 26.06% 和 29.58%。从数据分布的整体情况来看，本次研究的样本比较均衡。从父母的受教育程度来看，父母亲本科及以上学历占比均超过 40%，这基本符合 S 市总体人口的学历特征，也进一步说明样本具有一定代表性。

表 1 样本概况

家庭样本		个数	占总个数的比例（%）	
户口	城镇	608	61.17	
类型	农村	386	38.83	
子女	男	495	49.8	
性别	女	499	50.2	
孩子	初一	441	44.37	
	初二	259	26.06	
	初三	294	29.58	
是否单	是	89	8.95	
亲家庭	否	905	91.05	
父亲	小学以下	4	0.42	
	小学	14	1.48	
	初中	224	23.75	
	高中/中职/中专	269	28.53	
	大专	174	18.45	
	本科	211	22.38	
	硕士	43	4.56	
	博士	4	0.42	
	母亲	小学以下	6	0.63
	受教育	小学	24	2.51
程度	初中	263	27.51	

家庭样本	个数	占总个数的比例（%）
高中/中职/中专	215	22.49
大专	208	21.76
本科	210	21.97
硕士	28	2.93
博士	2	0.21

4 结果分析

4.1 描述性统计

4.1.1 因变量

研究的因变量为家长的课后服务满意度，在问卷中通过“您对目前学校提供的课后服务满意吗？”来测量。从表 2 的统计数据可知，占比最高的是非常满意，达到 38.03%；其次是比较满意，这两者的比例占样本量的 74.15%。但仍需注意到，有超过 24%的家长表示“比较不满意”和“非常不满意”。由此可知，整体而言家长对目前学校提供的课后服务满意度比较高，说明“双减”政策在提高课后服务水平方面取得了良好成效，但是数据结果也提示未来学校的课后服务质量仍有提升空间。

4.1.2 自变量

学业压力变化。通过问题“您认为，与“双减”前相比，目前您孩子的学业压力变化情况如何？”测量家长感知学生的学业压力变化，其中，61.77%的家长认为“双减”后孩子的孩子学业压力差不多；19.52%的家长认为政策施行后孩子的学业压力下降明显；还有 18.72%的家长认为政策施行后孩子学业压力明显增长。

作业量变化。调查显示，57.34%家长认为“双减”政策之后，孩子作业量变化不大；27.26%家长感知孩子作业量下降较多；仅一成左右的家长认为政策实施后，孩子作业量有所增加。

睡眠时间变化。关于孩子的睡眠时间变化，66.20%的家长认为与“双减”前相比，自家孩子的睡眠时间变化差不多；仅有 7.55%的家长认为孩子的睡眠时间有所下降；而有 26.26%的家长认为，“双减”后孩子的睡眠时间增长显著。

综合能力提升情况。问卷中设计“您认为，与“双减”前相比，目前您孩子的综合表现提升情况如何？”问题，从家长的角度来看学生的综合能力变化。数据表明，超过三成的家长认为与“双减”前相比，学生的综合能力有显著提升；60.46%的家长认为“双减”前后，学生的综合

能力差不多。

政策了解程度。从表 2 的数据可以看出，整体上，家长们对“双减”政策的了解程度较高。其中，48.59%的家长表示对“双减”政策“非常了解”和“比较了解”，仅有不到 5%的家长表示不了解。说明一方面家长们对教育政策的关心关注度很高，另一方面也表明 S 市的政策宣传、政策执行力度都比较到位。

综上所述，从课后服务满意程度、孩子学业压力变化、孩子作业量等多维度来看，家长普遍认为“双减”政策对教育减负存在积极效应。

表 2 核心变量分布情况表

变量名称	频数	比例 (%)
课后服务满意度		
非常满意	378	38.03
比较满意	359	36.12
一般满意	235	23.64
比较不满意	7	0.70
非常不满意	6	0.6
作业量变化		
增加非常多	41	4.12
增加较多	78	7.85
差不多	570	57.34
下降较多	271	27.26
下降非常多	34	3.42
综合能力提升		
提升非常大	93	9.36
提升较大	233	23.44
差不多	601	60.46
下降较大	56	5.63
下降非常大	11	1.11
学业压力变化		
增加非常多	59	5.94
增加较多	127	12.78
差不多	614	61.77
下降较多	168	16.90
下降非常多	26	2.62
睡眠时间变化		
增加非常多	65	6.54
增加较多	196	19.72
差不多	658	66.20
下降较多	58	5.84
下降非常多	17	1.71
政策了解程度		
非常了解	161	16.20
比较了解	322	32.39
一般了解	468	47.08
比较不了解	30	3.02
非常不了解	13	1.31

注释：还有 9 位家长表示学校不提供课后服务，当成缺失值处理。

4.2 回归分析

4.2.1 变量处理

根据上述变量的描述性分析可知，研究中因变量和自变量都是分类变量，在回归时将变量标准化处理并进行 100 分赋值，转化成连续变量进行统计。文章运用 OLS（最小二乘法）进行统计分析，结果表明回归模型显著（ $p<0.001$ ），且 $R^2=0.28$ ，模型具有较强的解释力（见表 3）。

表 3 回归结果统计

变量名称	课后服务满意度	标准误差
学业压力变化	0.011	(0.038)
作业量变化	-0.131***	(0.039)
睡眠时间变化	0.077*	(0.036)
综合能力提升变化	0.244***	(0.035)
政策了解程度	0.371***	(0.029)
家庭年收入	0.043	(0.045)
父母教育程度	-0.128	(0.122)
户籍地（以农村为参照）	-0.994	(1.220)
常数项	41.904***	(3.271)
显著性：*** $p<0.001$, ** $p<0.01$, * $p<0.05$		
R-squared=0.28		

4.2.2 回归结果

从表 3 的回归结果可知，家长感知孩子学业压力与家长对课后服务满意度之间呈正相关关系，但统计上不显著（ $p>0.1$ ），假设 H1 未得到证据支持。

家长感知孩子的作业量负向影响家长对课后服务的满意度，且统计显著（ $p<0.001$ ）；具体而言，孩子作业量每增加 1 个单位，家长的课后满意度就下降 13.1 个百分点，因此接受假设 H2。

在睡眠时间变化维度上，“双减”政策实施后，孩子睡眠时间每增加一个单位，家长的课后服务满意度就增加 7.7%，并且在 0.05 的统计水平上显著，可以接受假设 H3。

综合能力提升变化与家长的课后服务满意度呈显著的正相关（ $p<0.001$ ），具体而言，家长认为孩子的综合能力提升 1 个单位，家长的课后服务满意度就增加 37.1%，数据支持假设 H4。

类似地，家长对“双减”政策的了解程度与家长的课后服务满意度也表现出正相关，且在 0.001 的统计水平上显著。其中，家长对政策的了解程度每提高一个单位，家长的课后服务满意度就提升 37.1%，接受假设 H5。

此外，控制变量家庭年收入与家长的课后服务满

意度成正相关;父母教育程度与家长的课后服务满意度成负相关;相比农村户口,来自城市籍的父母对家长的课后服务满意度更低;但是,以上三个变量在 0.1 的水平上都不显著。

5 结论与讨论

研究通过描述性分析、OLS 回归模型等统计方法,得出以下几主要结论:

第一,被调查样本中,74.15%家长对目前学校提供的课后服务满意度比较高,这与一项针对 X 省 8 个县(区)的调查结果基本一致[17],说明“双减”政策在提高课后服务水平方面成效显著;但也有超过 24%的家长满意度较低,说明后续课后服务仍有提升空间。

第二,从家长感知出发,“双减”政策实施后,孩子的学业压力、作业量相对有所下降,孩子的睡眠时间、综合能力都有所增加,体现出“双减”政策的减负效果。

第三,回归模型分析结果显示,影响家长对课后服务满意度的主要因素有孩子的作业量、孩子睡眠时间、综合能力提升以及家长对“双减”政策的了解程度;具体而言,孩子作业量负担越重家长对课后服务满意度越低;孩子睡眠时间增加得越多、孩子综合能力提升得越明显、家长对“双减”政策的了解程度越高则家长对课后服务满意度越高。

由此可知,S 市在“双减”政策的执行过程上,在减轻学生作业量、降低学生学业压力以及增加学生睡眠时间等方面取得了良好成效,家长们对学校提供的课后服务满意度也比较高。

对此,本文建议:一方面进一步强化学校需履行课后服务的主体责任,充分考虑学生成长特点以及学生和家长需要,提高课后服务的水平;另一方面,加强精细化施策,在充分考虑学校规模、资源条件以及服务能力等多方因素的前提下,通过加强作业设计、减轻学生学业负担等方式进一步加强课后服务的供给和质量,切实提高学生和家长的获得感。

参考文献

- [1] 中华人民共和国教育部. 中共中央办公厅国务院办公厅印发《关于进一步减轻义务教育阶段学生作业负担和校外培训负担的意见》, http://www.moe.gov.cn/jyb_xxgk/moe_1777/moe_1778/202107/t20210724_546576.html
- [2] 吴开俊, 孟卫青. 治理视角下小学生课后托管的制度设计 [J]. 教育研究, 2015, 36(06): 55-63.
- [3] 杨启光, 朱纯洁. 论我国儿童课后照顾与教育服务的需求及政府责任 [J]. 教育理论与实践, 2014(34): 25-29.
- [4] 康丽颖, 贾丽. 中美儿童托管教育的比较分析 [J]. 比较教育研究, 2011(12): 20-23.
- [5] 王彦丽, 吕君. 韩国小学课后托管政策及其启示——以“放学后学校为例” [J]. 当代教育科学, 2018(09): 23-26+55.
- [6] 唐科莉. 欧洲国家“课后托管服务”面面观 [J]. 基础教育参考, 2014(021): 71-75.
- [7] 李智. 日本儿童课后照顾服务制度及其启示 [J]. 中南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 2016(02): 213-219.
- [8] 李会芹, 曾巧. “双减”政策实施四周年的成效、困境与破解之道——基于 H 区的实证调研 [J]. 教育科学论坛, 2026(02): 76-80.
- [9] 顾艳丽, 罗生全. 中小学课后服务政策的价值分析 [J]. 教育科学研究, 2018(09): 34-38.
- [10] 龚欣, 肖婕, 高巍, 等. “双减”三周年成效检视与优化路径研究——基于七省十九地市的实证调查 [J]. 教育发展研究, 2025, 45(Z2): 97-106.
- [11] 宁本涛, 杨柳. 中小學生“作业减负”政策实施成效及协同机制分析——基于全国 30 个省(市、区) 137 个地级市的调查 [J]. 中国电化教育, 2022(01): 9-16+23.
- [12] 黄冲, 王志伟, 姚奕鹏等. “双减”实施后 72.7%受访家长表示教育焦虑有所缓解 [N]. 中国青年报, 2021-09-16(010). <https://doi.org/10.38302/n.cnki.nzgqn.2021.003505>
- [13] 都晓. “双减”背景下的课后服务研究述论 [J]. 新疆师范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 2022(04): 50-61.
- [14] 罗生全, 张玉. “双减”与“双提”: 教学变革的逻辑转换与理念重构 [J]. 现代远程教育研究, 2022(02): 3-10+20.
- [15] 徐细雄, 占恒, 李万利. 党组织嵌入、政策感知与民营企业新增投资 [J]. 外国经济与管理, 2020(10): 3-16.
- [16] 罗泉, 侯浩翔. 义务教育阶段教师对“双减”的政策感知分析与改进建议 [J]. 中国电化教育, 2022(03): 22-29.
- [17] 唐延昕, 赵永辉. 中小学课后服务家长满意度及影响因素分析——基于 X 省 8 个县(区)的调查 [J]. 吉林省教育学院学报, 2023(02): 73-80.